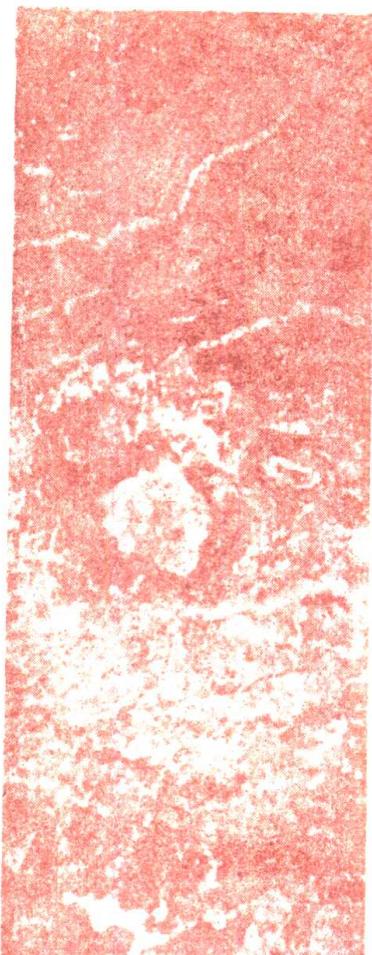


中国 灾荒史

张水良



中 国 灾 荒 史

(1927—1937)

张 水 良

厦门大学出版社

中 国 灾 荒 史

(1927—1937)

张水良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闽北报社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9.5印张 210千字

1990年6月 第1版 1990年6月 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册

ISBN 7—5615—0304—0 / F·61

定价：4.00元

目 录

引言	(1)
第一章 国民党统治区灾荒的实况	(6)
一 触目惊心的灾情	(6)
二 灾荒发展的特征	(10)
第二章 国民党统治区灾荒的成因	(20)
一 两种错误观点	(20)
(一)自然条件决定论	(20)
(二)人口过挤决定论	(23)
二 两条灾祸之根	(26)
(一)国民党新军阀的反动统治	(26)
(二)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掠夺	(50)
第三章 国民党统治区灾荒的影响	(63)
一 促使农民群众陷入更悲惨境地	(63)
(一)饥民遍地	(63)
(二)饿殍载道	(69)
(三)举家自杀	(73)
(四)卖妻鬻子	(75)
(五)逃荒乞食	(78)

二 加速农村经济崩溃	(91)
(一) 农产品歉收	(91)
(二) 劳动力激减	(99)
(三) 耕畜农具减少	(106)
(四) 耕地大量荒芜	(108)
三 招致城镇工商金融业衰落	(114)
(一) 工业凋敝	(115)
(二) 商业萧条	(116)
(三) 金融枯竭	(122)

第四章 国民党政府官僚及地主奸商的

趁火打劫	(126)
一 加捐加税	(127)
二 贪污赈款	(135)
三 扣留赈粮	(138)
四 增息追租	(141)
五 抬压物价	(149)
六 掠夺土地	(154)
七 穷奢极欲	(160)

第五章 国民党政府的“救灾”骗局 (164)

一 救灾美麦借款和美棉麦大借款的真相	(165)
二 杯水车薪和画饼充饥的赈款	(178)
三 有名无实的治水和封建徭役的工赈	(190)
四 啼笑皆非地为饿殍服丧和 念经求雨的笑剧	(204)

第六章 国民党统治区各地农民的自发斗争 (208)

一 饥民抢米风潮	(210)
二 农民抗租抗税	(227)

三 灾工群起反抗.....	(244)
第七章 革命根据地的生产救灾.....(253)	
一 苏维埃政府积极领导救灾度荒.....	(257)
(一)群众互助互济.....	(257)
(二)政府尽力帮助.....	(259)
二 农民群众大力开展生产自救.....	(263)
(一)兴修水利.....	(263)
(二)开荒造田.....	(270)
(三)劳动合作.....	(273)
(四)农业生产发展.....	(281)
(五)农民生活改善.....	(286)
后记.....	(295)

引　　言

灾荒在我国历史上曾是个大问题。翻开历史，从公元前206年到公元1949年的2,155年间，就有1,056次旱灾和1,029次水灾的记载，水旱灾害加起来几乎平均每年一次^①。其他的自然灾害，如蝗灾、雹灾、风灾、疫灾、地震等，则举不胜举。诚如已故的著名历史学家邓云特（邓拓）先生在其1937年出版的《中国救荒史》一书中所说的：“我国灾荒之多，世罕其匹”^②。西欧学者瓦尔忒·西·马罗立（Walter. H. Mallory）甚至著书称我国为“饥荒的中国”^③。

灾荒带给人民的苦难确实太深重了。“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就是这实况的写照。它同历代高压在人民头上的统治者一样，也是人民的一大威协，所以，人们常把天灾人祸连在一起。如明朝末年著名的农民起义军将领李岩所作的《劝赈歌》，就说得很是真切：

“年来蝗旱苦频仍，嚼啮禾苗岁不登。

①转引自新华社记者：《驯水记》。载1974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

②邓云特著：《中国救荒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11月初版，第1页。

③瓦尔忒·西·马罗立（Walter. H. Mallory）著：《饥荒的中国》，上海民智书局1926年10月初版。

米价升腾增数倍，黎民处处不聊生。
草根木叶充腹，儿女呱呱相向哭。
釜甑尘飞爨绝烟，数日难求一餐粥。
官府征粮纵虎差，豪家索债如狼豺。
可怜残喘存呼吸，魂魄先归泉壤埋。
骷髅遍地积如山，业重难过饥饿关。
能不教人数行泪，泪洒还成点血斑。”^①

再听抗日战争前流行在冀南的一首民歌：

“大水浪滔天，
十年倒有九年淹。
卖掉儿郎换把米，
卖掉妻子好上捐。
饿死黄牛打死狗，
背着包袱走天边。”^②

因此，在旧中国，人们一提到“灾荒”，就如“谈虎变色”，胆战心惊。“赤地千里，饿殍载道”，“洪水横流，尸飘四野”，诸如此类惨况的记载，不绝于史册。

民国成立以后，灾害连年不断。诚如邓云特所指出的：“民国成立至今，才26年，但此26年中，各种灾害之大者，统计其频数，竟也达77次之多。”^③当时还有人这样说道：

①计六奇：《明季北略》下，第23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52页。

②中国现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概况》，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67—68页。该书说：“由于统治者不理民事，不兴河工，河床常高出两岸，干流少而狭，支流多而宽，造成冀南十年倒有九年淹的情况。”

③邓云特著：《中国救荒史》，第40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

各种自然灾害，“中国无不包罗兼备，饱尝忧患。其灾害之程度，远者姑且勿论，仅民国成立之20余年间，中华民族元气之损伤于斯者，其数字真难以估计，此诚五洲各国稀有之现象也！”^①特别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军阀统治的建立之后的10年间，也即中国现代史上十年内战时期（1927—1937），国民党统治区的灾荒之多，灾情之重，灾区之广，灾民之众，更是世界所罕见的，如1929年的西北大旱灾——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先生写道：“……在这里，在中国西北，我目击数以千计的儿童死于饥荒。这场饥荒最终夺去了500多万人的生命。这在我一生是一个觉醒点。我在中国西北所见到的惨状是我亲身经历的战争、贫困、暴力和革命事件中最可怕的景象，直到十五年以后，我看见了纳粹的焚化炉和煤气室。德国纳粹没有耐心花时间等待人们饿死，就用这种设备消灭了六、七百人。

“萨拉齐（笔者注：现内蒙古自治区土默特右旗）是内蒙古最富饶的贸易中心之一。但是从1924年起，久旱无雨。今天，饥荒的魔影实际上威胁着辽阔的中国的四分之一的土地。

“这是一幅令人毛骨悚然的图景，一切生长中的东西，仿佛都被新近爆发的火山灰烬一扫而光。……”^②

又如1931年的长江流域大水灾——国民党政府的财政顾问阿瑟·恩·杨格写道：“据全国水灾赈济会报告，不仅超

①黄泽苍著：《中国天灾问题》，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8月初版，第88页。

②见（美）洛易斯·惠勒·斯诺编，王恩光，申葆青等合译：《斯诺眼中的中国》，中国学术出版社1982年版，第36—37页。

过中国苦难历史中任何一次水灾，而且也是世界历史中‘创记录的大灾’……。65,000平方英里的土地淹没在水中，另有5,000平方英里土地受灾较轻。受灾地域比英国全境还大，约相等于纽约、康涅狄克、新泽西三个洲合起来的面积。受灾人民约达2,500万*。堤岸溃决的时候成千上万的人惨遭没顶。几百万人不得不在严冬的大部分时间内辗转流离。淹没地区平均水深最高达九英尺；这些地区内的农舍有45%被冲毁。损失总额估计为国币20亿元，包括9亿元谷物损失在内。”^①蒋介石在当时也承认说：“中正‘视察’灾区，自苏而皖，自赣而鄂，上下千里，泛滥洋溢，横流浸淫，庐舍荡然，流亡沟壑，民叹其鱼，凄怆怛恻，极人世惨酷之悲境，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也”^②。

再如1934年的全国水旱灾——中国共产党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写道：

“伴随着空前未有的民族危机，今年又发生了近百年来空前未有的大旱灾与近60年来所未有的大水灾，这使整个中国民族处在饥饿，死亡，毁灭之境！就今年水旱两灾的区

①(美)阿瑟·恩·杨格著，陈泽宪、陈霞飞译：《1927至1937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23—424页。

•此灾民数字，是被大大缩小的。据中共中央《关于全国灾荒与我们的策略的决议》(1931年7月30日)说：“今年全国所发生的大水灾……现在已经有一万万以上的民众完全变成了没有饭吃，没有工做，没有地方住的灾民”。(见《红旗周报》，第17期，1931年9月15日出版)又据上引《中国救荒史》一书第45页载：“二十年(1931)苏、皖、赣、鄂、湘、豫、浙、鲁八省大水。……灾民一万万人”。

②见1931年10月3日《大公报》。

域而言，水灾偏重于中国北部，旱灾偏重于中部与南部，同时在大部份省份中，许多是水旱两灾并重的。……在以上所述这些省份中，无地无水灾冰雹霖雨风霜山洪与蝗虫之害。根据目前各省受灾县区不完备的统计，……总共受灾县区是在一千余县左右。完全无衣无食的灾民，在一万多以上，……”^①。

这里，人们不禁要问：直至今日还被台湾某些学者称为所谓“黄金十年”^②（即十年内战）时期的国民党统治区，为什么会屡次创造中国甚至是世界灾荒史上的“记录”呢？

这本小册子，正是试图探讨这一问题。它力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历史材料为依据，叙述十年内战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灾荒的实况、成因及影响，分析帝国主义列强和国民党新军阀对人民残酷的经济剥削与政治压迫，是造成严重灾荒的主要原因，批判当时国内外资产阶级学者的“自然条件决定论”、“人口过挤决定论”等等错误观点。

本书还叙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的生产救灾及其取得的巨大成就，说明只有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建立人民的政权，才能使中国农民摆脱贫困、饥饿、死亡的境地，过着安居乐业、丰衣足食的生活。从而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的腐朽，加深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认识。

①《发动水灾旱荒斗争的提纲》。《斗争》，第72期，1934年9月23日出版。

②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经济发展史》，第一册，（台湾）近代中国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2页。

第一章 国民党统治区灾荒的实况

一 触目惊心的灾情

据历史资料记载，国民党政府建立的最初十一年（1927—1937）间，年年、处处都有灾荒，如斯诺在其名著《西行漫记》一书中写道：

“……自从南京分裂了革命的有生力量以后，中国的情形是每况愈下了。……农村人口中间普遍存在的贫穷和困苦的情况日益恶化。……每天有天灾人祸的消息传来，这要是在大多数国家就会被认为是不得了，但是在中国已多少成了司空见惯的常事。举例说，甚至当我执笔在写本章的时候，报上就载着从华中、华西发来的这样骇人听闻的消息：

豫、皖、陕、甘、川、黔各省灾情，续有所闻。全国显然已遭多年来最严重的灾难，已有千万人死亡。据最近川灾救济委员会调查，该省灾区人口3千万人，已有好几万人食树皮和观音土充饥。据传陕西现有灾民40余万人，甘肃百余万人，河南约700万人，贵州约300万人。贵州灾区遍及60县，官方的中央社承认是百年来最严重的一次灾荒*。”①

①（美）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12月版，第72—73页。*原注1937年5月15日北平出版的《民主》。

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起见，笔者不妨摘录上引《中国救荒史》一书中有关资料，逐年列举于下：

“十六年（1927）5月，甘肃地震，被灾20余县，压死者3万7千余人，受伤约在4万余人，房屋倒塌4万间。鲁省蝗、旱灾尤重，受灾者9百万人。长江下流大水。甘肃武威县渠涨，被淹人口7百余，冲没乡村143村，冲毁房屋3千余间，牲畜死亡共2千余头，田亩被没不计其数。

“十七年（1928）绥、晋、赣、黔、湘、皖、川、浙、滇大水，皖尤重，就稻作一项，损失4百余万元。冀、鲁、豫、陕、甘、察、热、黔、闽、鄂、苏、粤、桂遭旱，被灾535县，灾民3,339万余人。共计是年水旱被灾区达21省，共1,093县，灾民约计达7千万人以上，被灾县份占全国14%，灾民占8%。浙省受虫害最重，约损失1万万元。

“十八年（1929）陕、甘、豫、晋、察、绥、皖等大旱，灾民3千4百万人，其他各省均有罹及。川、鲁及陕北等省有局部水灾，苏、皖、鲁、赣、豫、晋、鄂、冀受虫害，沿湖一带，损失达20,265,000元。

“十九年（1930）陕、晋、察、甘、湘、豫、黔、川、热、苏、赣等均水、旱，被灾县份达517县，灾民21,113,078人，死亡人数10,860人，损失201,829,628元。陕、甘灾尤重，居民初则吃树皮，继则卖儿鬻女，终则裂啖死尸，易食生人，以上各省罹虫患县份188县，灾民8,724,770人，死亡人口21,392人，损失153,387,705元。罹风雹灾民达3百万人，损失3千万余元。

“二十年（1931）苏、皖、赣、鄂、湘、豫、浙、鲁八省大水。被灾区域达32万平方里，灾民4万万人，被淹田亩2万5千5万亩，被淹人口265,154人，农产品损失4万

5千7百万元，被灾290县。其中以皖省灾情最重，占八省22%，县份44%中间，有131县大地沉没者达数个月，损失每户平均达457元。因江、淮水患被灾区多罹疫病，陕、甘、川、热等亢旱，陕、湘、热虫。

“二十一年（1932）豫、陕、皖、甘、青、鲁大旱。晋、陕、豫等省均霜雹，灾区达数十县，晋尤重，五县损害甚巨。吉、黑、晋、豫、皖、赣、冀、湘、陕、鲁、粤、北满等大水灾，晋尤重，淹没70余万亩，灾民达数千万人。鲁、皖、豫飞虫灾。

“二十二年（1933）8月，黄河决口。被灾人数3,642,514人，死亡人数18,293人，房屋倒塌1,685,369间，淹没田亩12,742,647亩，牲畜伤害63,639头，损失232,214,648元。绥远、山西、河北、河南、湖南等省影响颇巨。河北省各河堤决，淹没数十村庄，农田四万余顷，黄河上游堤溃，溺死2千人以上。河南滑县尤重，被灾面积达5千余方里，灾民30余万人。淹没房屋45万间，死亡不计其数，财产损失3千余万元。山东被灾区20余县，灾民百余万人。湖南8月，四大河流大涨，田庐淹没。扬子江上游水势奔腾而下，江水暴涨，沿江各县被淹没。安徽十余县水，江西14县水，损失数百万元，灾民10余万人。甘肃省暴风雨，淹没屋宇田园。又地震，瘟疫流行，疫者50余县，人民损失甚大。晋西中一带，疫病几遍全省。陕、粤、豫、黔、晋、滇、青海、宁夏、绥、闽等省旱，被灾达70余县，财产损失尤巨。豫、皖、冀、浙、湘、陕、晋、苏、鲁等9省蝗，被害面积6,863,033亩，损失14,779,215元。陕、豫、晋、甘等省冰雹风霜，被灾达100余县。晋省太原附近冰雹，大如卵，损毁衣物甚重。

“二十三年（1934）鄂、湘、豫、冀、晋、陕、川、

皖、赣、闽、察省水，淹田地363,491,000亩。黄河决口，长垣、濮阳一带，尽成泽国，直至翌年3月，仍大水围城，灾情奇重。苏、皖、浙、鄂、豫、赣、滇、陕等14省，313县，旱、水、蝗，损失达10万万元。本年水旱蝗灾，农田被灾面积1千6百余万亩，损失约1千3百余万元，受灾9省195县。7月粤大风，倒塌无数，拔木沉舟，又12省89县风霜灾，安徽旱，饥饿死者，不下数千人，逃亡者数百户。

“二十四年（1935）成都地震三次。九江等县饥民多自杀。长江、黄河泛滥，鄂、湘、赣、皖、冀、鲁、豫、苏八省，被灾面积64,904,496方里，灾民20,595,826人，财产损失415,701,905元。就灾民人数计算每人平均损失20元。东北各地水冲毁桥梁，溺死男女5百余人，灾民9千人，被灾23县。冀、赣、苏、豫、鄂、浙、闽、晋、皖、江、陕、湘等省旱，又虫灾，8省68县，疫风雹，12省89县，农作物被害成数在54%。又浙、闽、粤、黔、陕、晋、甘、宁、辽9省均水，全国被水灾县份330县，灾民2千3百余万人，财产损失8万4千万元。又晋、陕、鲁、皖旱。

“二十五年（1936）12月，太原地震。四川饥饿，死7百余人，饥民争食树皮草根充饥，不下10余万人。皖南之六安县，饿毙数千人，逃亡数百家，饿殍载道。苏北淮阴、泗阳等县瘟疫流行，黑热病，达2千余万人。浙江杭县一带，螟蝗，损失稻量6,900担，价值75,600元，豫之汲县以北蝗害禾苗殆尽。河北旱，大风，苗麦枯萎，灾民食树叶野菜。河南、四川旱，秋粮无着，灾民达87,548人。

“二十六年（1937）皖、陕、蜀、豫、黔、桂、宁、贵、鲁、甘等省旱，灾民餐树皮榆叶等充饥。蜀、豫尤重，蜀省饿死者3千余人，灾民3千余万人，被灾县共41县，占全

省 9 /10，豫灾民男女老幼，达千万人，受灾县数十余，占全省灾区 1/3。豫、闽、粤、冀等省瘟疫流行，粤定安县鼠疫，死者不计其数。豫省孟津、鄢陵、洛阳等县，风，苗麦被害，秋收无望，损毁房屋无数，灾民达 30 余万人。甘肃省及豫西各县，饥民鬻妻卖子度日，倒尸载道，乞食者达万余人。临沣县稻苞虫为害甚巨，损失 50%，害田 4 百亩。四川省虫灾亦烈，被灾区占全省 4/5，灾民 2 千万人。浙省虫，损失谷 2,610,440 石，值银 7,831,320 元，又川、黔、桂、及陕北荒旱。闽泉州、福清、莆田、惠安、晋江等县瘟疫流行。”^①

这里，“我想不必多列举了，就凭上引这些国民党政府公布的，及当时报刊披露的材料，已足见十年内战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灾荒之频繁，灾区之广大，灾民之众多，灾情之惨重了。真是触目惊心！”

二 灾荒发展的特征

年年遭灾，无年不荒；处处遭灾，无处不荒——这是十年内战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灾荒发展过程的显著征象即特征之一。下表所列 1912—1937 年各种灾害的频数，可为前者即年年遭灾，无年不荒之据：

^① 邓云特著：《中国救荒史》，第 43—48 页。

表一 1912—1937年各种灾害频数

类别	水灾	旱灾	蝗灾	雹灾	风灾	疫灾	地震	霜雪	歉饥	总计
频数	24	14	9	4	6	6	10	2	2	77

资料来源：邓云特著：《中国救荒史》，第56页。

笔者按：此表系据原表删节。

据上表，在26年中发生的各种自然灾害计77次，几乎平均每年三次，而其中尤以1927年国民党新军阀统治的建立以来灾荒的频数为多，它不但是无年无灾，而且常有一年多灾。

至于后者即处处遭灾，无处不荒的情况，可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对其所概括的一句话说，即“白区遍地灾荒”。^①同样的，它不但是无处无灾，而且常有一处多灾。如1938年，全国20个省受灾种类计有水、旱、蝗、风、火、霜、雹、疫、山崩、地震等十种左右，而各省在这一年中遭受的灾害有二种至五种之多。

详见下表：

表二 1938年全国各省受灾种类

省 别	灾 害 名 称	被 灾 县 市
甘 肃	旱、雹、地震、风	65
陕 西	旱、蝗、疫	85
山 西	旱、蝗、疫	86
绥 远	旱、地震	17
河 南	旱、地震	22

^①见《红色中华》，第33期，1938年9月13日出版。